

中国古铜镜在日本早期国家政权形成中的作用

——兼论日本出土的三面画文带神兽镜

杨金平

(徐州工程学院艺术学院 江苏徐州 221000)

内容提要 :日本古坟时期众多的墓室里出土了大量中国古铜镜,它们是三国时魏明帝赐给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铜镜,这些铜镜帮助和佐证了日本大和王权的建立,并对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 :画文带神兽镜 日本 影响

中图分类号 :K876.41

文献标识码 :A

“公元239年,中华帝国的皇帝历史上首次承认‘倭王’作为全体倭人种族的代表,具有唯一的合法性。‘承认’倭国是倭人种族的公称,认可了倭国倭王的地位。”^[1]这是日本当代学者山屋幸久先生对中国史书《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关于日本古代国家形成的最早一段记载翔实的译注。它记载了238年6月(景初二年六月)当时的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派遣使者向魏国朝贡;其年十二月,诏书报倭女王曰:“制昭亲魏倭王卑弥呼,特赐汝……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皆装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2]此举是历史上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第一次发生的正式外交关系,它不仅认可了邪马台国作为独立国家的存在和女王的正统地位,同时魏明帝厚赐的“铜镜百枚”对崇尚“鬼道”用铜镜表示身份和祭器治理国家的日本早期政权影响重大而深远。今天,日本出土的各类铜镜远远超出百面,其中具有典型特征的三角缘神兽镜就有350面之多。但是它们和魏明帝所赐的中国诸镜相距甚远,那么它们究竟由谁设计铸造,它们背面的图像纹饰代表了什么,它们和卑弥呼女王的铜镜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当然,它们和中国古铜镜都被用来为这一时期日本的王权服务,因为它们全出土在3世纪后半期至6世纪中期众多的前方后圆的古坟

中,这种具有祭坛和墓室双重作用的大型古坟是日本大和王权统一全国的成熟的标志^[2]。因此,对日本出土的具有明确出处的“铜镜百枚”和不明出处的“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研究也就成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重大课题,它不仅要证实中国古铜镜在日本古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也要证实古代日本是如何把中国文化转换成王权政治要求的形式。本文仅从日本早期3座古坟出土的3面“画文带神兽镜”入手探讨它们各自的图像成因及彼此间的关联背景,以期梳理出一个明朗的线条解开上述众谜团中的一点。

一、ホケノ山古坟出土的画文带神兽镜

ホケノ山古坟位于日本京都奈良附近,在箸墓古坟的东边,是早期的前方后圆形制的古坟。日本有关学者认为它极有可能是邪马台国统治者的坟墓^[3]。在用石块围起来的墓室棺木残骸中间发现了这面制作精良、图像丰富的“画文带神兽镜”^[4],它和上海博物馆藏“吾作神人神兽镜”^[5]基本相同,尺寸略大。“画文带神兽镜”(图一)直径19.0厘米,圆钮,连珠纹钮座。中间图饰带按2:1切割率划分成两部分,为同向式布局,共分三层。上层区域两神兽三神人,两神兽背绕两乳钉,一前爪扣车轴,一后爪踏纹饰圈。车轴同另外两个短轴、圆环构成车轮,其中一个短轴被神兽翅膀勾住,形成上升趋势。在两个短轴之间有限的空间里,各铸一长

收稿日期 2008-08-08

作者简介 杨金平(1953-)女,徐州工程学院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油画、古铜镜。



图一//



图二//

袖拱起、抬头仰望的小小凡人。两神兽头部上方的元宝状空间里坐着双手抚琴的伯牙,下方右边是神情凝重的钟子期,左边侧身低头跪坐的伴奏之人是伯牙学生成连^[6]。他们身后两神兽口衔车辕、贴体而过,车辕顶端内卷,没有同钮座旁的两个圆环连接。从该组画面分析,它们表现的是伯牙诸人升天的情景。中段左边是顶戴矮冠的东王公,右边是发饰元宝冠的西王母,他们前后和下面均有飞动的小神兽神鸟。下段两侧是怀抱乳钉的神兽,也口衔车辕和其它几个短轴、圆环构成四个车轮,中间两个车轮下方是熊黑。熊黑的入镜在中国许多古铜镜和其它艺术品中都可以看到《诗经·国风·斯干》云:“维熊维黑,男子之祥。”上面端坐在车辕前的是黄帝,黄帝两侧有肩生羽翼的仙人,众图像均采用浮雕塑型。绕此一周是一道略坡起的小三角纹,采用这种纹饰和工艺做界圈在中国出土的众多神人神兽镜中极为罕见,前述“吾作神人神兽镜”的此处乃用单线环界定中间图饰带的两部分。ホケノ山古坟的“画文带神兽镜”第二部分由14个方枚、14个半圆构成图饰带,方枚高出镜平面,每个方枚上有4字铭文,从黄帝左下方左转起句:“吾作明竟,幽练三商……生如金石,其师命长。”共98字,字迹细小工整。半圆纹饰又高出方枚,上铸平面剔底的卷云纹,与镜边的卷云纹同工艺,并都为右卷。环整个方枚半圆图饰带乃一道莲花瓣纹,点状底纹。

该镜边宽大高起,贴镜内边一道锐角三角纹;镜边里圈一周神兽、神鸟、飞车和日月仙人组成的昼夜不息运转的图像,浅浮雕铸型,外圈是棱状几

何纹,旁饰卷云纹。这种宽厚边多纹饰的画纹带神兽镜也就是东汉晚期流行的神人神兽镜,多出土在湖北鄂城、浙江会稽(绍兴),但前者远比后者出土量大,且种类繁多。纵观这两地出土的铜镜和其它地区出土的相关铜镜,无一面可与日本ホケノ山古坟出土的“画文带神兽镜”媲美。由此可知,魏明帝曹叡所下诏书中的“赐汝好物”确实把当时魏国中上好的铜镜赠给了卑弥呼女王,可以想像,卑弥呼女王得到此镜时的欣喜。不仅如此,这种镜式肯定也受到其他倭人的爱好,对它大量的使用和仿制证实了这点。但是,后仿制的铜镜在中间图饰带里发生了变化,如车辕、车轮和车轴的弱化或消失,神人神兽的变异和简化等,而且它们中间有一些是同范同型镜,日本目前发现计有24面,出土在5世纪中期至6世纪前半期的17座古坟里就有20面^[7]。当然,来自中国本土铜镜的价值依旧是至高无上的,不仅因为它们华美的图像和精湛的工艺,也因为它们代表了古坟早期王者的身份和地位。在崇尚“鬼道”即巫术的“日本古代铜镜成为‘太阳的象征’、‘太阳的图像’,女祭师因此成为太阳女神和拥有太阳般伟大力量的通灵神。所以,她们成为3世纪前半期的鬼道祭神”^[8]。毋庸置疑,魏明帝赠送的铜镜对巩固卑弥呼女王和她的继承人在邪马台国的统治是极其重要的。

除这面铜镜之外,黑塚古坟出土的另一面画纹带神兽镜也说明了这一点。

二 黑塚古坟出土的画纹带神兽镜

1998年日本天理市教育委员会、橿原考古研

研究所共同发掘调查了黑塚古坟,它邻靠ホケノ山古坟,其棺木排水除湿的设计较前者先进。从这座竖穴式石室的栲木棺里出土了33面三角缘神兽镜,其中大部分破裂,这些铜镜面向外、背向里地摆放在木棺顶端的周围,在它们中心位置斜立着一面完整的“画纹带神兽镜”(图二)^[9]。这面铜镜直径13.5厘米,圆钮,圆环钮座。中间图饰带同ホケノ山古坟的“画纹带神兽镜”一样由两部分构成,其内圈的神人神兽采用同向式和求心式并存的布局方法分为三段。上段绕乳钉两神兽,两兽之间坐一人乃伯牙,膝上置琴。中段头向内身朝外盘腿而坐两神人,右侧东王公头戴三珠连冠,左侧西王母,发饰高耸,眉清目秀,薄衣丰姿。两人身后没有羽人,其中西王母的造型似汉时贵妇写照,在中国两汉和三国魏晋时期的铜镜中此形像难得一见。下段两神兽背绕乳钉,中间一人失模无法辨认。众图像也为浮雕塑型,围众图像乃一单线环。环外的方枚半圆图饰带中共12个方枚和12个半圆,其布局工艺和ホケノ山古坟出土铜镜相同,仅方枚上铸一字,从东王公右下顺时针方向起句:“吾作明镜自有纪□□公宜子”。镜边的样式同前镜一致。该镜无论从大小尺寸、图像纹饰和铭文内容同ホケノ山古坟铜镜比较相距甚远,然而在设计上都源于东汉时期开始盛行的道家文化思想。它在黑塚古坟众多铜镜中占据显赫位置,而且它的摆放形式也十分耐人寻味,出土时拍摄的照片显示四个神人里唯西王母头朝上身居祥座^[10]。从对该镜的分析判断它应是“铜镜百枚”中的又一面,环绕它的三角缘神兽镜间接地证明此点。那么这两座古坟之间必然存在着密切关系,从卑弥呼女王死后立男王,但“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这段《倭人传》的文字记载了当时邪马台国内的战乱与稳定。倭人能服从年幼的女王是和她具有卑弥呼女王的宗女身份与巫术有关。而且她为女王后,又遣使带着礼物回访魏朝廷,此举对巩固和加强壹与女王的统治地位是不可轻视的。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黑塚古坟的主人是谁,但是在这两座早期紧邻着的古坟中出现的两面中国“画纹带神兽镜”绝不会是巧合,而且它们都摆放在木棺的中心位置。此外,黑塚古坟出土的众多三角缘神兽镜已具有该镜种的典型特征,超大的镜体尺寸,特有的图像纹饰和等腰三角形的镜缘。这种成熟风格的铜镜表明它们已从中国东汉晚期流行的神人神兽镜和画像镜的影响中脱离出来,形成了符合日本王权政治要求的铜镜样式。还有在三角

缘神兽镜里出现的众多女性形象,她们和这两面“画纹带神兽镜”中西王母大不相同,其中一些镜中的女性形象无论发饰面容都是普通的女性形象,如“吾作徐州铭四神四兽镜”^[11]、“新作徐州铭四神四兽镜”^[12];尤为醒目的是两位女性共坐一起,四位女性同现在一个镜背图饰中,个中原因不能排除卑弥呼女王和壹与女王之间的继承关系及她们共同拥有的政治地位。

黑塚古坟明显晚于ホケノ山古坟,但这两座古坟先后相差的时间究竟有多长目前没有见到相关的考古检测报告。在这段不明确的时间里,日本已拥有一定数量的三角缘神兽镜,如果讲从铸有“景初三年铭画纹带同向式神兽镜”^[13]和“神原神社古坟出土景初三年铭镜”^[14]来确定它们被制造的时间,那么它们和魏明帝的百枚铜镜抵达日本的时间是同一年,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ホケノ山古坟为什么没有出土一面三角缘神兽镜?《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卑弥呼以死”,其“以”字是否指卑弥呼女王的非正常死亡,如系正常死亡,她不会立男王;“更立男王”造成了国内大乱三年,后立壹与为王,国内始安定。这里说明两个事实:其一是世俗的男性大王代表着经济力的发展同女性祭师代表着巫术文化之间的权力争夺;其二是此时的日本还处在巫术文化的传统之中,体现两种力量碰撞的证据之一就是ホケノ山古坟中出土的中国“画纹带神兽镜”等,而没有三角缘神兽镜。是古坟主人生前就有过不准用三角缘神兽镜随葬的安排,还是其继承者另有苦衷而不便使用三角缘神兽镜?那么,深受中国神人神兽镜影响的三角缘神兽镜究竟出自何方、来源何处,不仅关系到日本古代国家的成立,还关系到中国古铜镜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巨大影响。

三 椿井古坟出土的“天王日月·兽纹带同向式神兽镜”

画纹带神兽镜在日本早期古坟里除上述两面中国制造的铜镜之外,还有其它古坟出土的一些,但本章节谈到的是1953年日本京都府椿井大塚山古坟出土的一面“天王日月·兽纹带同向式神兽镜”,笔者把它归类于画纹带神兽镜是因该镜中间图饰带明确受到ホケノ山古坟铜镜的影响。“天王日月·兽纹带同向式神兽镜”^[15]直径23.4厘米,圆钮、连珠纹钮座。中间图饰带由两部分构成,内圈部分划为三段,上段并列坐三人:钟子期、俞伯牙和成连。三人的动作衣着、面容五官看上去同ホケノ山古坟铜镜相似,但深入比较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大的差异:首先是颜面,三人都没有胡须,

表情滑稽有趣。第二,三人身体结构不准确,缺少立体过渡,尤其是成连弹拨乐器的右手直接模仿ホケノ山古坟铜镜里钟子期的左手,放在此处无法弹拨乐器。第三,他们两边的神兽虽然采取和ホケノ山古坟铜镜中神兽同样的动作,但乳钉已被移至图饰圈边,而且神兽的具体形态和口中所衔的车轭也有变化,失去了ホケノ山古坟铜镜里神兽们驾车拔地升天的宏伟气势和巧妙穿插。中段右侧是头戴三冠帽的男神人,上方铸笠松形纹饰。左侧呈求心式端坐一女神人,头戴元宝状帽饰,双手拢在小袖口里,下身有裙摆。她是镜中诸神里唯一正面正身而坐的神人,也是完全脱离ホケノ山古坟铜镜中西王母影响的神人。在她的左边也有一笠松形纹饰,上大下小中有柱杆,底座西边的勾连纹饰把它和女神人的座垫一起向上抬起,构成此处女神人升天的画面。下段中间的神人乃黄帝,黄帝和他身边的羽人对比ホケノ山古坟铜镜也发生了改动。另外,黄帝两边的神兽和上段神兽一样变的温顺和小型化。这里的乳钉同样被移至图饰圈边,乳钉的移位乃是这面镜中最根本的变化,它们实际上反映出乳钉已失去了在中国古铜镜中做为四方、四极的重大作用,仅是划分镜面区域、点缀图像的辅助纹饰。第四,环绕众图像一周的三角纹没有改变,它已成为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必然组成部分。该镜外圈部分是方枚半圆图饰带,但图饰带里的半圆纹饰消失,取替它们的是七组奇禽异兽。半圆纹饰的消失和乳钉的移位一样折射出这面铜镜的制作者对该纹饰的不理解或不认同,他们不知道这种纹饰代表了道家文化中由人成仙的一个关键步骤:登名山筑灵台,方能朝拜众神,有机会得秘方获灵丹羽化成仙。中国古铜镜里类似这种布局处理该图饰圈仅见上海博物馆藏的“八子神兽镜”^[16]。此外,圈中共7个方枚,每个方枚上刻有4字铭文“天王日月”,右起读句。方枚上铸同样文字的神人神兽镜目前有图可查的是洛阳出土的“天王日月神兽镜”^[17]和安徽寿县出土的“天王日月环状乳神兽镜”^[18]两面,左起读句,都为东汉墓的随葬品。相比ホケノ山古坟铜镜“天王日月·兽文带同向式神兽镜”表面明显不同的是其边饰处理,它采用中国东汉晚期画像镜的边饰风格:镜边高起镜平面,但贴边一道小三角纹,边饰铸两道大三角纹内夹一道双线波浪纹,镜缘内缓外陡,是日本早期三角缘神兽镜的镜缘样式。

综上所述,椿井古坟出土的这面铜镜的布局和图像表明它的设计思想开始从中国道家文化里对神仙极乐世界的向往转至对日本巫术和世俗双

重权力的代表者“天王”的崇拜。因此,它的镜背图饰出现了女性神人升天的特有画面和刻有“天王日月”字样的铭文。当然,这种铜镜样式没有被广泛采用,其内在的原因应该是两国之间文化的转型和女性祭师统治时代的逐渐结束,一个由男性大王掌管权力的时代再次开始了。此时它无法忽略自古以来日本民族对太阳神祇的崇拜和对女性祭师的认可,一个新政权要得到巩固,它必然会在初创伊始尊敬本民族原有的信仰。这样,出现在椿井古坟里的这面“天王日月·兽文带神兽镜”和其它铜镜就真实地反映了巫术权力和世俗权力共存的日本早期国家政权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侧面。

其次,在这座古坟里也出土了一面保存完好、图像精美的“画文带神兽镜”^[19],从其布局造型判断,它晚于前面两座古坟的铜镜,应是东汉末期三国初期在湖北鄂州镜坊制造,和它图像造型相同的鄂州古镜有“鎏金画纹带环状乳神兽镜”^[20]和“盖惟顺环状乳神兽镜”^[21],后者镜面出现一神人手持节型纹饰而坐的图像。椿井古坟出土的随葬品中除了大量的铜镜之外有刀、斧和铁甲等,这些兵器是否表明古坟的主人是男性大王?如是男性大王它再次证实此时的日本政权过渡到了一个世俗化的时期。

最后,椿井古坟出土的许多三角缘神兽镜,其中有多面同黑塚古坟出土的铜镜共为同范同型镜,具典型特征的是椿井12号“天王日月·兽文带四神四兽镜”^[22],它同黑塚28号镜为一模所制。这两面镜中出现的神人神兽无论在设计布局、形象动作诸方面不同于一墓出土的“天王日月·兽文带同向式神兽镜”,已完全脱离了它的构思图像成为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代表样式之一。这里再次提出一个问题,即这两座古坟共有的同范同型镜说明它们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铸造,那么,这两座古坟之间也存在着联系,只是这种联系不像ホケノ山古坟和黑塚古坟那样密切,它呈现出一种引人注目的转换。在上述两座古坟中身居木棺中心的画文带神兽镜不再是这一时期古坟里的圣品,伴随它一起出土的还有中国制造的直径27.8厘米的“长宜子孙内行花纹镜”^[23]和直径18.4厘米的“方格规矩四神镜”^[24],它们都是东汉时期在中国大陆流行的镜种,时间上均早于神人神兽镜,且都是同类镜中超大型的头版头模镜,特别是“长宜子孙内行花纹镜”比目前所知国内最大尺寸的“长宜子孙流云纹连弧纹镜”^[25]还大出2.2厘米,它们和魏明帝赠送的“铜镜百枚”之间同样存在着割不断的联系。

四 结语

日本在 2 世纪前半期就有用中国制造的铜镜入墓做随葬品的习俗,多集中在北九州。3 世纪开始这种习俗向近畿地区(现京都奈良一带)转移。同时,该地区出现了众多的前方后圆形制的古坟。其中最早的是奈良盆地东南部三轮山麓的箸墓古坟,它被日本学者推测也是巫女的古坟^[26]。在它周围筑有ホケノ山古坟、黑塚古坟、椿井古坟和其它一些古坟。从这些古坟里都出土了铜镜,具代表性的是本文详述的前两座古坟里的“画纹带神兽镜”,它们不仅是承载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之间最早发生外交关系的信物,同时也是带去中国古代文化的使者,以它们为首的中国古铜镜正式融入了当时巫术盛行的日本朝野,成为邪马台国女王们治理国家事务的重要祭器和巩固国家政权的必备神物。另一方面,日本在接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同时,开始了本民族文化的革新与完善。这点从椿井古坟出土的“天王日月·兽纹带神兽镜”和其它三角缘神兽镜上可以明确看到。三角缘神兽镜的出现实际上是中国古铜镜影响的结果,它以东汉晚期在中国南方流行的神人神兽镜为主流,在极短的时间里促使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大量生产,并被后来的统治者陆续使用和随葬在自己的墓室里。它们结合古坟的样式,从当时邪马台国所在地的奈良地区逐渐向周边地区辐射,时间长达 3 个世纪左右。这段时间是日本从巫术时代走向世俗权力的时代,也是从诸小国走向一个统一国家的时代,中国古铜镜见证了这段历史并为此做出了划时代性的伟大贡献。

(本文有关日本三角缘神兽镜和日本古坟资

料承蒙日本京都关西中国研修センター有限公司代表取缔役、理事长本田满先生、日本地理学会中原恒男先生和徐州博物馆李银德馆长提供,特表感谢。)

- [1][8]金关恕、森岡秀人、森下章司、山尾幸久、吉井秀夫:《古坟のはじまりを考える》,日本学生社 2005 年,第 11、47~48 页。
- [2][3][4][6][7][9][10][11][12][15][19][22][23][24]
- [26]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研究所附属博物馆、京都大学、东京新闻編集《大古坟展—ヤマト王权と古坟の鏡》,大塚巧芸社 2000 年,第 8 页,参考樋口隆康《ヤマト王权と古坟の鏡》一文,第 222 页;参考河上邦彦《ホケノ山古坟の发掘とその意义》一文,第 22、23、140、93 页,第 57 页右上图、左上图,第 76 页上图、下图,第 92 页上图、右下图、第 74、92 页,第 26 页右上图、左下图。
- [5]陈佩芳编:《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7 年,第 38 页图 62。
- [13][14][日]福永伸哉(司会)、冈村秀典、岸本直文、车琦正彦、小山田宏一、森下章司《三角缘神兽镜》,日本学生社 2003 年,第 93 页图 2、第 50 页图 10。
- [16][17]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第 16 卷·铜镜》,第 94 页图 92、第 93 页图 91。
- [18]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文物出版社 1992 年,第 414 页。
- [20][21]丁莹华主编:《鄂州铜镜》,中国文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51 页图 122、第 46 页图 111。
- [25]杨金平《东汉连弧纹镜考述》,《东南文化》2007 年第 1 期。

On the Role of the Ancient Chinese Bronze Mirror in the State Power at the Early Age of Japan: on the 3 pieces of the Triangular-rimmed Bronze Mirrors with Gods & Beasts Pattern and Decorated Edge Unearthed in Japan

YANG Jin-ping

(School of Arts, X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221000)

Abstract: A lot of Chinese ancient bronze mirrors were unearthed from many Japanese ancient graves in Japanese Ancient Graves Period. They were gifts granted by Emperor Ming of Wei Kingdom to the Queen Beimiho of Yamato Kingdom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se mirrors help and testified the establishment of Japanese Yamato Kingdom monarchy. They also dramatically influenced Japanese triangular-rimmed bronze mirrors with gods and beasts pattern.

Key words: bronze mirror with decorated edge and gods and beasts pattern; Japan; influence